

“殷鉴”一词来源于《诗经·大雅·荡》。该诗的作者借文王之口，对于商纣王及其贵族的暴虐、荒淫、昏愤，造成民怨沸腾、内忧外困、国势将倾的局面，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和现实的警告。诗里说：“文王开口叹声长，叹你殷商末代王！多少凶暴强横贼，敲骨吸髓又贪财，窃据高位享厚禄，有权有势太猖狂……殷商镜子并不远，就在夏桀那一王。”在这里，诗人深刻地指出，由于商纣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骄奢淫逸，引起全国人民，乃至外族鬼方的愤怒和敌视，最后作者归结为：“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殷人灭夏，殷人的子孙，应该以夏的灭亡作为鉴戒。这句话揭示了一个历史教训，即夏代的灭亡，就是殷代的前车之鉴。

该诗作者更深层的意思是周也要以殷为借鉴。后来形成“殷鉴不远”的成语，用来泛指可以作为后人鉴戒的前人失败之事，告诫人们决不可忘记历史的教训。《诗经·大雅·文王》中说：“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诗中告诫周统治者要以殷末灭亡为镜子，要懂得天命得之不易，注意修德以配天命。

商汤和伊尹吸取夏亡的教训

“殷鉴”一词虽然来源于《诗经·大雅·荡》，但其渊源可追溯到殷初。殷初经历了一次政权的更替、社会的动荡和盛衰的演变，所以，殷商的开国之君商汤以夏为鉴，吸取夏朝灭亡的经验教训作《汤诰》，要求其臣属“有功于民，勤力乃事”。对那些亡国的夏民，则仍保留“夏社”，并封其后人。商汤注意“以宽治民”，因此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矛盾较为缓和，政权较为稳定，国力也日益强盛。《荀子·解蔽》篇中说，成汤有鉴于夏桀败亡的教训，很有主见，谨慎地治理国

“殷鉴”小考

——周初对商代灭亡教训的总结

□ 韩 星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论述概括了历史对今天的重要性，也提示我们要多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今人来说，中国历代王朝的兴替更是一整座巨大的

家，并长期任用一代贤相伊尹，所作所为合于大道。伊尹为殷初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辅助商汤灭夏，为商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殷初统治者是如何以夏为鉴的，古文《尚书·汤誓》中说，夏桀耗尽民力，盘剥夏国的人民。商汤有鉴于夏桀滥用民力、横征暴敛而导致民怨的教训，践天子位后不近声色，不聚货财；任用有德行的人，犒赏有功劳的人；用人之言像自己说的一样，改正过错毫不吝惜；能宽能仁，把他的诚信昭示于万民。

商汤去世以后，伊尹历经外丙、仲壬两王，之后又做了汤王长孙太甲的师保。太甲继位，不遵先祖商汤的大政方针，昏庸无道。为了教育太甲，伊尹将太甲放逐到成汤墓葬之地桐宫，他本人与诸大臣代为执政，史称共和执政，并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等对太甲进行训诫。他通过分析夏桀失天下而成汤得天下的原因，告诫太甲要吸取教训，居安思危，修德勤政，讲述如何为政，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以及如

何继承成汤的法度等等。《说命下》也载殷王武丁时的贤相傅说告诫武丁的话：“要学习古训，才会有得；建立事业不效法古训而能长治久安的，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如果您能够借鉴先王的成法，将不会有失误。”以上史料都反映了殷人的以史为鉴思想。

周公的天命观

到了西周初年，周公还政于成王后，先后作了《康诰》《酒诰》《洛诰》《立政》和《无逸》等诰文，直接指出要吸取殷人的教训。

《酒诰》是周公命康叔去卫国宣告戒酒的诰词，因此称之为《酒诰》。殷末风气奢华，酗酒败德，纣王更是昏醉于酒池肉林，自招速亡。正是有鉴于此，周公在诰词中指出：“殷人没有明德芳香的祭祀升闻于上天，只有老百姓的怨气、群臣私自饮酒的腥气升闻于上。所以，上天对殷那降下了灾祸，不喜欢殷国，就是因为统治者淫乐的缘故。”《无逸》篇中，周公历数殷代贤王中宗、高宗、祖甲，更举

出了周室先祖太王、王季、文王，他们都能勤劳国事、体察民心、接受批评、改正过失，这样国家既能繁荣昌盛，诸王也得康宁长寿，于国家于王身都大为有益。反之则殷末诸王好逸恶劳、骄奢淫逸、无视民间疾苦，国事日非，终致丧亡，诸王本身也是“罔或克寿”，短命夭折。最后，周公训诫周成王及其后继者要牢记这一历史教训。《尚书·君奭》载周公说：“君啊，我是非常信任你太保奭的，希望你能够尊重我所说的，和我一道吸取殷商亡国的教训，时时顾虑上天的惩罚。”

《尚书·召诰》主旨仍然是以夏殷兴亡为鉴，劝勉成王勤勉为政，敬德保民。《召诰》从历史经验出发，先回顾了夏命转移到商的过程——观察古时候的先民夏代，上天教导顺从慈悲，努力考求天意，现在夏已经丧失了王命。接着又考察了殷命移周的历史——现在观察殷代，上天教导顺从嘉保，努力考求天意，现在殷也已经丧失了王命。最后把这种历史的鉴戒提升到了“夏监”“殷监”的高度：

“我们不可不鉴戒夏代，也不可不鉴戒殷代。我不敢说，夏接受天命有长久时间；我也不敢说，夏的国运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重视行德政，才过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我不敢说，殷接受天命有长久时间；我也不敢说，殷的国运不会延长。我只知道他们不重视行德政，才过早失去了他们的福命。现今大王继承了治理天下的大命，我们也该思考这两个国家的命运，继承他们的功业。”《召诰》在这里系统地提出了“夏监”“殷监”，即夏鉴、殷鉴的历史鉴戒思想，告诫周初的为政者，周要以夏、殷的兴亡为借鉴，总结夏、殷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保持天命和国运的长久。这些话都反映了周公摄政以来的天命观及其以史为鉴的意识，形成了一种可贵的历史理性精神，其目的是为了

避免重蹈夏、商灭亡的覆辙，实现周王朝的长治久安。

总之，周人以夏、殷的兴亡为借鉴，通过总结夏、殷两代的历史经验教训并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从最初的“殷人以夏代覆亡为镜鉴”，演变为

倡薄葬之风

□ 石志刚

薄葬是圣贤之说被重新重视的展示。中国自古就有薄葬的说法。《礼记》中说：“葬也者，藏也。”这段话意思是说一个人去世后要被藏在草丛中。这种下葬的方式非常简单俭朴。生命来自于自然、归于自然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被深深地打下了烙印。孔子亦提倡薄葬。当孔子的弟子颜渊死了之后，“门人欲厚葬”，孔子回答说：“不可。”孔子的回答与孔子主张薄葬的一贯提法是

一脉相承的。孔子羡慕古人“墓而不坟”，提倡遗体入土为安即可。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对待葬礼上仍然强调薄葬。孟子对之前的时代提倡薄葬表达了赞赏之情：“盖上古世尝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当然，孔孟提出的儒家学说，提倡薄葬，反对厚葬，更为看重的是失亲后孝道的传承、悲痛

的流露，而厚葬既与死去之人无感，又增加活人之负担，是一大弊俗。汉代杨贵就此进一步丰富了儒家反对厚葬的思想：“夫厚葬诚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单币，腐之地下。”

薄葬是正确价值观塑造的重要手段。司马光之所以为后人所尊重，在于他的个人道德构建和说理厚重。为了提倡节俭精神，反对追求奢华之风，回击人们对墓葬的邪说认识，司马光从理论和实践上十分重视对薄葬的强调和突出。晚年的司马光撰写《葬论》，对阴阳风水至曲和偏离丧葬礼仪秩序的行为进行纠正，进而提出对故去之人应以薄葬的观点。薄葬是司马家族的精神遗产传承，司马光为其祖父、父亲薄葬的行为而自豪，并且告诫子孙亦以薄葬待

他，希望子孙亦能传承这种薄葬之俗。当宋仁宗为其宠妃董克媛去世而以厚葬待之，司马光立刻向皇帝提出“凡丧事所须悉从减损”主张。司马光在洛阳所居之地，非常简陋，在简陋的环境中，编修《资治通鉴》。当时，司马光妻子去世，竟没有余财为其妻下葬，只能将仅有的三顷地典当出去，置棺办丧，完成葬妻任务。从典地葬妻一事可以看出，司马光对薄葬的坚持，已经渗透到对至亲之人的行为中。

薄葬是重塑政治风气的重要利器。良好政治风气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这里面有统治者对传统习俗坚定的矫正意志在发挥重要作用。封建社会中，皇帝生前为自己死后提前修建豪华的墓地，并制定出奢侈的厚葬规定，会被认为是符合皇家规范和行为的。然而，一些有作为的统治者，能够突破因袭，矫正奢华厚葬之习俗，倡导薄葬之良俗，旨在为重塑和延续良好政治风气作出制度安排。隋文帝以国事为重为理由，在遗诏中告诫臣僚，准备自己葬礼的时候，“务从节俭，不得劳人”。他还从细节入手，告诫地方官员“宜各率其职，不须奔驰”，以免为参加其葬礼而造成处理政务空缺、影响百姓正常生活。

薄葬是官员廉洁奉公的重要象征。古代有许多官员，在任职过程中，勤勤恳恳、廉洁从政，等到他们去世的时候，连出殡的费用都没有，堪称清官循吏。宋仁宗时期，有一个叫曹修古的官员，他在监察御史

的任上，忠义廉洁，在官员队伍中享有美誉。等到曹修古去世的时候，家无余资，竟然连殓尸用的衣服都没有。曹修古的同僚们听闻此事，为其集资凑了点钱送给曹家。曹修古的女儿知其父廉洁一生，哭着对其母说：“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坚决不受其父同僚资助之钱，以显其家风清正。

薄葬是构建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标尺。社会秩序稳定的突出表现在于形成遵守法制、安居乐业、经济繁荣的局面。反之，社会秩序不稳定，不遵守法治、不安居乐业、经济凋敝的局面就会出现。唐太宗在《戒厚葬诏》中对那些提倡厚葬之人的心理进行揣摩：“以厚葬为奉终，高坟为行孝。”厚葬之风会形成“遂使衣衾棺槨，极雕刻之华；当灵明器，穷金玉之费”的奢华浪费现象。追求厚葬之人破坏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富者越法度以相尚，贫者破资产而不逮。”认识到厚葬是破坏稳定社会秩序的利器，唐太宗告诫臣僚要对此进行深入改革：“为害既深，宜有惩革。”唐太宗由此颁布了具体惩罚旨意：“其公以下，爰及黎庶，送终之具有乖令式者，明加检察，随状科罪。”

（上接1版）中国实践的成就、中国道路的成功，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可以说，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才使得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运动正逐渐走出了低谷，走到新时代。

改革开放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

从1516年英国人莫尔发表《乌托邦》一书开始算起，社会主义已有500多年历史。然而，在19世纪中叶之前，社会主义还停留于空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改变了社会主义的命运，使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的伟大飞跃，使无产阶级运动实现了由自发到自觉的伟大飞跃。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武器，是人民群众改变自己命运的思想武器。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要发挥指导作用，必须随着实践、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必须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本土化。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一部社会主义运动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青春的密码，也是社会主义运动能够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密码。

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先进理论而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也因理论创新而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但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同样坚信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90多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指导革

命取得胜利，指导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指导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历史已经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我们的事业就能够不断推进前进；什么时候我们固守本本、漠视实践，我们就会走弯路、犯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变化最大的时期，我们用短短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辜负这个时代。这40年，我们党理论创新的脚步始终未曾停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和如何发展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升到新水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理论创新步伐明显加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要求，进行了艰辛理论探索，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全新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飞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新境界，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

党人的理论创造力。

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史说明，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践又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其提供源泉和动力。相信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随着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也会不断取得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必将不断被推进到新境界，科学社会主义也必将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机活力。

改革开放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探索出了社会主义新路

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现代化，每一时期现代化的内涵也各不相同。比如，党的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人理解的现代化就是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十八大后，又提出治理现代化，并成为建设的重点。与此相对应，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必须与这个国家的情性和性质相适应、与时代发展相一致。

在社会主义产生之前，现代化道路是单数，资本主义是唯一的现代化之路，西方人把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明。社会主义产生后，现代化道路成为复数。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中，社会主义似乎“败下阵”来，社会主义似乎无法把一个国家带入现代化。于是，有了“历史终结论”和“社会主义失败论”等。但如前所言，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现代化道路碰到了极大难题，需要发挥人类的历史智慧加以解决，需要探寻新的文明发展之路。

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更不能邯郸学步、照搬别国的模式。从历史上看，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在200多年历史上，那些成功迈入现代化门槛的国家和地区相对于中国来说体量都不算大。美国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的现代化国家，它于18世纪末开始现代化，至20世纪中叶完成，那时它的人口才1.5亿左右，人均GDP在1万美元上下，而中国现在有近14亿人口，2017年GDP是82.7万亿元。中国是在一个体量无比庞大、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其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其伟大性和创造性前所未有，其冲击力

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以史为鉴”思想，从整体上反映了周初历史意识的强化和历史理性精神的觉醒。

殷鉴意识传之后人

西周以后，“殷鉴”也就成为历代思想家、为政者和广大人民总结、借鉴历史经验教训的代名词。《国语·楚语上》中强调对太子进行历史教育时说：“教导太子《春秋》，是为了扬善抑恶，用来劝诫教导人的本心；教导太子《世》是为了彰显德行而摒弃昏昧，用来约束人的行为……教导太子《语》，使他知道仁德的作用，从而知道上古圣王是如何用仁德治理民众的。教导太子《故志》，使人知道兴废之事而能够警惕自己的行为。”其中的《春秋》《世》《语》《故志》，都是当时的史书。

《孟子·离娄上》云：“夏桀、殷纣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民众的拥戴；之所以失去了民众的拥戴，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获得民心是有方法的，他们想要的，就给他们并让他们积蓄起来；他们憎恶的，就不强加给他们，仅此而已。残害自己的百姓过于厉害，自己就会被杀、国家灭亡；即使不太厉害，也会自己遭遇危险、国家削弱。死后被称为周代昏乱之君的幽王与厉王，即使是后代有孝顺仁慈的子孙，历经百世后恶名也无法更改。《诗经》上说：‘殷商的借鉴并不遥远，就在那夏桀统治的时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都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殷鉴”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充分说明“殷鉴”思想对中国传统政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和影响力也前所未有。从现实看，美国以世界42%左右的人口消耗了全球资源的大约25%。按照这样的比例，如果追求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按照这样的道路实现现代化，那么把世界现有的全部资源都给中国也不够用。单纯从资源角度看，西方文明不是人类文明的未来，当然也不是广大发展中国的未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走得怎么样，最终要靠事实来说话。改革开放40年的成功实践证明，我们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对于这条道路，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只要认准了、认定了，就坚定不移走下去。党的十九大擘画了未来30多年的发展，那就是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现代化强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将出现第一个以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意味着到那时，不仅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社会主义运动将迎来一个高潮，科学社会主义旗帜将高高飘扬。

看来，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单是一个民族再现自己的辉煌，不单是满足13亿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单是影响全球的格局、拉动世界的经济，而且是一种“文明的崛起”，是一条道路和一种制度的成功，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的问世和被肯定、被追随，是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主张的吸引力、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它向世人昭示的是，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现代化之路不是单数，而是复数。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新的成功之路，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就是改革开放对社会主义的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的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兴才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大事件”，必将对人类文明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系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主任）